

商山道上的白居易

李寶玲*

摘 要

詩是中國文學的精華，唐代是詩發展的高峰，詩人們把唐代的社會點綴得五彩繽紛，研究唐代詩人及其詩作，自是一件令人十分愉悅的工作。而唐代也是一個擁有豐沛行動力的朝代，行遍天下的唐代詩人，不僅在行於道途時寫詩，更將他們所寫的詩作，帶到唐代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形成唐代的「文學社會化、社會文學化」的特殊現象。

唐代交通極為發達，嚴耕望在《唐代交通圖考》一書中考證甚詳，唐代的首要驛道是連絡首都長安與東都洛陽之間的交通大道，其次便是南道。南道即藍田武關驛道，或稱之商山道。唐代中葉以後，因經濟文化中心南移，南道愈顯其要。白居易這位中唐詩人，一生多次往返於商山道上，且在詩作中留下不少與商山道相關的作品，本文擬從一樣的商山道、不一樣的心情；商山道上元白之唱和；商山道與唐詩的傳播等三個不同的角度，探討白居易所寫之商山道相關作品，希望藉由這樣的爬梳過程，清楚了解白居易當時的心志，更能對唐代的「文學社會化、社會文學化」特殊現象的形成，有具體清晰的認識。

關鍵詞：唐代、唐詩、白居易、商山道

*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專任講師，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

唐代國勢甚強，與其交通發達有密切關係，嚴耕望在《唐代交通圖考》序中指出「全國大道西達安西（或至蔥嶺），東窮遼海，北踰沙磧，南盡海隅，莫不置館驛，通使命，而國疆之外，凡唐之聲威所曾屆達處，亦頗有中國館驛之記錄。」¹在如此發達的交通網中，首都長安自然成爲全國交通的中心點，從長安向東出發有南北兩道，北道出通化門，經長樂驛、滋水驛至昭應縣，達潼關、洛陽，此爲當時全國第一驛道；南道出延興門或春明門，至太寧驛，經故驛、五松驛至藍田縣，達襄陽、江南或轉赴川黔。²南道即藍田武關驛道，或稱之商山道。唐代中葉以後，因經濟文化中心南移，南道愈顯其要。唐德宗時更明令規定其爲僅次於兩都之驛道，爲全國第二驛道，是南北交通之大動脈。³

南道的重要性不在於軍事，而在於文化與經濟，戴偉華在其〈唐代文學研究中的文人空間排序〉一文中指出：

我們在審視經濟繁榮、文化繁榮和作家分佈的變遷問題時，作家佔籍又成了一個重要的參照物。如果把唐代的詩人佔籍作爲一個整體來認識，則北方籍作家的比例超出南方，而南方相對集中的是江南東西道，……如果考慮到時間因素，中晚唐南方地區的詩人佔籍增長率顯然超出北方，……⁴

隨著南方文化經濟的繁榮，愈來愈多的士子前往京城謀求功名；也隨著南方文化經濟的繁榮，愈來愈多的官商前往南方謀求利益，聯繫南北的商山道，不折不扣的成爲一條「名利道」，唐代有不少詩人都在此道上留下詩作，特別是像中唐詩人白居易，寫於商山道上的作品就非常多。就像他在〈登商山最高頂〉一詩中所說：

高高此山頂，四望唯煙雲。下有一條路，通達楚與秦。或名誘其心，或利牽其身。乘者及負者，來去何云云。我亦斯人徒，未能出囂塵。

¹ 見《唐代交通圖考（一）》頁5。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十三。1985年。台北。

² 參考《唐代交通圖考（一）》頁9。

³ 見《唐代交通圖考（三）》頁637。

⁴ 見《唐代文學研究叢稿》頁20。學生書局。1999年。台北。

七年三往復，何得笑他人。⁵

「七年三往復」指的是白居易在元和十年（西元八一五年）赴江州司馬任、元和十五年（西元八二〇年）自忠州刺史返及長慶二年（西元八二二年）赴杭州刺史任的三次行於商山道的經驗。於商山道上汲汲於名利的白居易，一生在商山道上的往返並不僅止於這三次；他多次的往返，顯示商山道是與白居易畢生關係最密切的一條道路之一。白居易在商山道上之作所呈現的自然景物取向，就是白居易人格意志的呈現，鋪陳行跡的道路和白居易本身的契合度甚高，這些作品正是引導我們去理解白居易心志的最佳途徑。本文所討論的內容，便是以白居易所寫的有關商山道的作品為主，透過這些作品，我們可以更進一步認識白居易這位詩人，更可以觀察白居易如何利用行於商山道上的機會，將他所寫的詩作和好友的詩作，有效地傳播開來，帶到他所到達的每一個角落。

壹、一樣的商山道，不一樣的心情

唐代宗大曆七年（西元七七二年）白居易生於鄭州新鄭縣，十二歲時因兩河兵禍逃難於越中，從此生活於江南，十五歲曾旅蘇、杭二郡，二十三歲在襄陽，作〈遊襄陽懷孟浩然〉（《全唐詩》卷432），二十七歲移家洛陽，二十九歲在長安應試及第。白居易早年雖往返於南北經商山道，卻未見有詩作記錄旅途之心志。⁶

憲宗元和十年（西元八一五年）白居易四十四歲，因武元衡、裴度被暗殺一事上疏，復因王涯之參奏，接連被貶謫至江州。八月白居易出藍田，過韓公堆、藍橋驛、商州、四皓廟、武關到襄陽，經漢水，十二月至江州擔任司馬之閒差。白居易就像所有被貶謫至南方的詩人一樣，充滿惆悵的心情。其〈初貶官過望秦嶺〉詩云：

草草辭家憂後事，遲遲去國問前途。望上秦嶺回頭立，無限秋風吹白

鬚。⁷

按照當時的規定，唐代凡是被貶謫的官員，在詔書下達的隔日必須即刻起程。白

⁵ 見《全唐詩》卷431。

⁶ 以上參考朱金城《白居易年譜》頁1-20。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台北。

⁷ 見《全唐詩》卷438。

詩中「草草辭家」指的是實際的狀況，而「遲遲去國」則是當時心情寫照。京城漸行漸遠，難以割捨登高的回眸一望，此際「秋風吹白鬚」道盡了貶謫官吏的淒涼。戴偉華〈南貶作家的創作傾向和柳宗元作品的「騷怨」〉一文中說：

唐代官吏貶謫一般都貶往南方，儘管安史之亂後，南方的經濟之於北方有了長足發展，因此而刺激了南方文化的發展，但以仕為人生價值體現的古代知識分子仍然嚮往著政治中心所在的地方。有時因為生活所計請求外放江南（多指富庶地區），但一位官吏終老於南方仍然算是一生中最大的悲劇。何況南貶都是到所謂惡地，那裡的經濟、文化仍然是非常落後的。⁸

初踏上貶謫之路的白居易，心情的苦悶可想而知。走到韓公堆的白居易，心情就更加苦悶了。從唐代的史料得知，達官貶流，往往賜死於此。⁹白居易在此寫下〈韓公堆寄元九〉：

韓公堆北澗西頭，冷雨涼風拂面秋。努力南行少惆悵，江州猶似勝通州。¹⁰

秋季的風雨給白居易的感覺竟是如寒冬一般的「冷雨涼風」，行至韓公堆的白居易不得不強打起精神，自我寬慰的告訴自己，若比起元稹被貶通州司馬的遭遇，已算是幸運的了。

順著驛道而行，白居易走過藍田驛、青泥驛、過七盤嶺後至藍橋驛，白居易在〈初出藍田路作〉一詩記錄沿途所經之路的崎嶇難行：

停驂問前路，路在秋雲裏。蒼蒼縣南道，去途從此始。絕頂忽上盤，

⁸ 同註4。頁91-92。

⁹ 可參考《唐代交通圖考（三）》頁638-640。

眾山皆下視。下視千萬峰，峰頭如浪起。朝經韓公坡，夕次藍橋水。

潯陽近四千，始行七十里。人煩馬蹄阻，勞苦已如此。¹¹

唐代由長安往江南有兩條路線，一為出潼關經洛陽折而南行或東經汴河水路南行之兩都驛道；一為經藍田、武關至鄧州而南行之藍武驛道。前者道路平坦易行，但費時費日，後者山路崎嶇，卻較近捷，被貶官吏無從選擇，一律經由藍武驛道南行。¹²唐代驛站之設置，大抵三十里為一驛，商山道上的驛站，相距皆不滿三十里，蓋因山路陡峭滯礙難行之故。¹³白居易此詩中的「人煩馬蹄阻，勞苦已如此」充分說明此段路程之艱困。

順著商山道往前接北川驛、安山驛、過麻澗至仙娥驛，往前些便是商州，白居易在商州驛館等候妻孥以便同行赴江州。〈發商州〉詩中便說明：

商州館裏停三日，待得妻孥相逐行。若比李三猶自勝，兒啼婦哭不聞

聲。¹⁴

唐代在天寶五載後對貶官的處理非常嚴苛，「日馳十驛」¹⁵的規定，使得遭貶謫之人的行進速度被要求比平常人行進速度高出一倍；白居易匆匆離京，沿途曉行夜宿，至離京較遠的商州，始得些微喘息的機會。此詩中的李三即李固言，當時新歿，白居易不斷以友人如元稹、李固言等人更悲慘的遭遇來安慰自己，強作寬解，更可窺見其內心之深沉苦悶。

離商州不遠的四皓驛，附近有四皓廟，是商山道上唐代詩人題詩最多的景點¹⁶，白居易至此寫了〈仙娥峰下作〉及〈題四皓廟〉二詩。〈仙娥峰下作〉一詩如

¹⁰同註7。

¹¹見《全唐詩》卷433。

¹²可參考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三）》頁664；亦可參考尚永亮《元和五大詩人與貶謫文學考論》附錄二〈柳宗元劉禹錫兩被貶遷三度往返所經路途考〉頁417-418。天津出版社。1993年。台北。

¹³同註9。

¹⁴同註7。

¹⁵見《唐會要》卷41「左降官及流人」條。唐代以三十里為一驛，日馳十驛等於一天行三百里。

¹⁶《全唐詩》中以「四皓」或「商山廟」命名之詩共有十九首之多，如卷181有李白〈商山四皓〉、〈過四皓墓〉；卷271有竇常〈四皓祠堂即事〉、竇庠〈四皓驛聽琴送王師簡歸湖南使幕〉；卷396有元稹〈四皓廟〉；卷425有白居易〈答四皓廟〉、卷438〈題四皓廟〉；卷472有蔡京〈四皓〉；卷478有陸暢〈題商山廟〉；卷523杜牧〈題商山四皓廟一絕〉；卷534有許渾〈題四皓廟〉、卷538〈題四老廟二首〉；卷541有李商隱〈四皓廟〉；卷579有溫庭筠〈四皓〉；卷586

下：

我為東南行，始登商山道。商山無數峰，最愛仙娥好。參差樹若插，
匝匝雲如抱。渴望寒玉泉，香聞紫芝草。青崖屏峭碧，白石床鋪縞。
向無如此物，安足留四皓。感彼私自問，歸山何不早。可能塵土中，
還隨眾人老。¹⁷

而〈題四皓廟〉詩云：

臥逃秦亂起安劉，舒卷如雲得自由。若有精靈應笑我，不成一事謫江
州。¹⁸

仙娥峰的景色一定十分特殊，否則心情苦悶至極的白居易不會有暫時遺忘內心痛苦，轉而欣賞風景的心情，然而這種輕鬆畢竟是短暫的，白居易有感於商山四皓於舒卷自由當中便有安劉之效，自己努力了大半輩子，卻是一事無成，〈題四皓廟〉詩乍看似是輕鬆揶揄口吻，但早歲聰慧、詩名遠播的白居易，如何能忍受四十四歲才被貶謫，前途一片茫然的煎熬。

過四皓驛之後，商山道的沿途是壽泉店、洛源驛、至商洛縣的棣華驛，再經桃花驛、層峰驛便達武關，此後是青雲驛、分水嶺、陽城驛（後改名為富水驛）、至內鄉縣，再過商於驛、臨湍驛、冠軍驛至鄧州，往南過故鄧城不久即是襄陽，襄陽縣西有漢陰驛，白居易於此換由水路，經漢水，乘舟至江州，下列兩首都是舟行之時所作，如〈襄陽舟夜〉：

下馬襄陽郭，移舟漢陰驛。秋風截江起，寒浪連天白。本是多愁人，

有劉滄〈題四皓廟〉；卷 588 有李頻〈過四皓廟〉；卷 647 有胡曾〈四皓廟〉；卷 672 有唐彥謙〈四老廟〉及卷 771 有蔣吉〈四老廟〉。

¹⁷同註 11。

¹⁸同註 7。

復此風波夕。¹⁹

〈江舟夜行〉詩云：

煙澹月濛濛，舟行夜色中。江鋪滿槽水，帆展半檣風。叫曙嗷嗷雁，
啼秋唧唧蟲。只應摧北客，早作白鬚翁²⁰。

雖是舟行，免去人馬困頓之苦，但觀察白居易這幾首作品，仍是鬱抑憂悶，絲毫輕鬆不得。唐曉敏在《中唐文學思想研究》一書中說：

人情感的強烈程度往往與人的遭際有密切的關係。強烈的情感往往源於強烈的對比，首先是生活境況的鮮明對比，如果生活中缺少變化，人就難於有豐富強烈的情感。其次也源於自己心中理想與現實的對比。當個體心中有這高遠理想之時，這種理想即與現實形成一種強烈的對比。在這種對比中，「平凡」的現實也可以令個體產生豐富的感受。²¹

看白居易被貶謫至江州任司馬沿途所寫下的幾首紀行詩，無論是生活境況或是心中理想都與他在京城時有著強烈的對比，無怪乎這些詩作所反映出來的情感會如此強烈。

白居易被貶至江州後，生活有極大的變化，雖然歷來研究顯示，最晚在貞元十六、十七年（西元八〇〇、八〇一年）間，白居易便與佛教有相當的接觸並受其影響²²。但白居易被貶謫江州後，心情鬱悶，宗教成爲心靈慰藉的良藥²³，而江

¹⁹同註 7。

²⁰同註 7。

²¹見《中唐文學思想研究》頁 217。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北京。

²²日人平野顯照認為「從白居易的作為當中可以看出在貞元十六、十七年左右，他在精神上已顯著地傾向佛教。」《唐代文學與佛教》頁 23。業強出版社。1987 年。台北。謝思燁認為「白

州之廬山又是佛教勝地，此時白居易與名僧的交往非常頻繁，在佛教的信仰上也有了更上層樓的體悟。根據謝思燁在《白居易集綜論》中的說法，此時的白居易在佛教信仰上，和從前比較之後，至少有三方面的改變：一是開始對西方淨土表示嚮往；二是大量閱讀寺院藏經閣中之佛教經典，對佛教的認識有相當的提昇；三是與廬山附近的隱士交往，對隱居生活表現出從未有過的興趣。²⁴白居易終其一生，都十分珍惜與重視這個階段的際遇，即使在離開江州之後，他仍與此階段所交往的友人保持密切的書信來往，這樣的轉變對白居易以後的生活產生極大的影響，甚至種下日後將詩文集藏於江州附近廬山東林寺的因緣種子。

元和十四年春，白居易離開江州轉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夏，自忠州召還，經三峽，由商山路返回長安，此時白居易已經四十九歲。在返京途中白居易沿路寫了〈別種東坡花樹兩絕〉、〈別橋上竹〉、〈發白狗峽次黃牛峽登高寺卻望忠州〉²⁵等詩，多年後再踏上商山道，白居易不免感觸良多，在〈商山路有感〉一詩中他寫道：

萬里路長在，六年身始歸。所經多舊館，大半主人非。²⁶

詩中沒有見到興奮昂揚的情緒，反而對物是人非有著相當強烈的感慨，在〈惻惻吟〉詩中，白居易也有著同樣沉重的心境：

惻惻復惻惻，逐臣返鄉國。前事難重論，少年不再得。泥塗絳老頭班

白，炎瘴靈均面黎黑。六年不死卻歸來，道著姓名人不識。²⁷

原是「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的知名詩人，沒想到短短六年，成爲

居易未曾言及他的家庭是否有佛教信仰的傳統，他本人的佛教信仰大概開始於步入仕途的三十歲前後。」《白居易集綜論》頁252。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北京。孫昌武則認為「居易有《八漸偈》，作於貞元二十年，紀念於前一年去世的洛陽聖善寺凝公，……按這裏的敘述，他師事凝公當在貞元十五年二十八歲由宣城北歸洛陽以後。」《唐代文學與佛教》頁98。谷風出版社。1987年。台北。

²³按照陳寅恪的說法，此階段的白居易與道教的關係亦極為密切。可參考《元白詩箋證稿》頁321-331〈白樂天之思想行為與佛道關係〉一文。世界書局。1975年。台北。

²⁴參考《白居易集綜論》頁273-278。

²⁵三詩皆在《全唐詩》卷441。

²⁶同註25。

²⁷同註25。

「道著姓名人不識」的窘境，變化如此之大，真是令人情何以堪！在〈商山路驛桐樹昔與微之前後題名處〉詩，白居易說：

與君前後多貶謫，五度經過此路隅。笑問庭中老桐樹，這回歸去免來

無？²⁸

此詩中的「笑」字實蘊含著更多的無奈與辛酸，回到長安不久的白居易，在仕途上選擇外任，放棄多數人夢寐以求的京官，遠赴杭州任刺史的蛛絲馬跡，細看此詩便可尋繹。

唐代在永貞革新失敗之後，緊接著甘露之變，人們從政治上的失意，轉而成政治上的恐懼，全身遠禍的觀念是當時普遍的想法。白居易回到長安，擔任中書舍人，眼看當時的宰相王播、蕭俛、杜元穎、崔植等人不斷地主張對河北削減兵力，消極主和，白居易上書主張用兵，不被穆宗接受，於是在長慶二年七月，要求外任杭州刺史。孫昌武在〈白居易的佛教信仰與生活態度〉一文中表示：

白居易的佛教信仰，是他整個世界觀的一個嚴重的消極方面，他在政

治鬥爭中漸趨消極，人生態度漸趨頹唐，創作中滋長著越來越強烈的

脫離現實、追求閒適的傾向，都與越來越深重的佛教的浸染有很大關

係。²⁹

白居易有這樣的選擇，一點也不讓人意外。早在江州、忠州時，我們看到宗教對白居易的影響；又從忠州回京途中，觀察白居易所寫的詩作中所反映出來的心境；回到長安後，看著昔日舊交的相繼凋零，白居易遠赴杭州之舉，乍看雖是得之於偶然，實際卻是發之於必然。

長慶二年七月，白居易重新踏上商山道，前去杭州，一路內心百感交集，再作〈商山路有感〉詩並附序言，序曰：

²⁸同註 25。

²⁹見《唐代文學與佛教》頁 115。

前年夏，予自忠州刺史除書歸闕，時刑部李十一侍郎、戶部崔二十員外亦自澧、果二郡守徵還，相次入關，皆同此路。今年，予自中書舍人授杭州刺史，又由此途出，二君已逝，予獨南行，追歎興懷，慨然成詠。後來又有與杓直、虞平遊者，見此短什，能無惻惻乎？儻未忘情，請為繼和。長慶二年七月三十日，題於內鄉縣南亭云爾。

詩云：

憶昨徵還日，三人歸路同。此生都是夢，前事旋成空。杓直泉埋玉，
虞平燭過風。唯殘樂天在，頭白向江東。

後又繼之〈重感〉一詩：

停驂歇路隅，重感一長吁。擾擾生還死，紛紛榮又枯。困支青竹杖，
閒捋白髭鬚。莫歎身衰老，交遊半已無。³⁰

這兩首詩有著「青山獨去」瀟灑無奈的深沉感慨，但杭州此行畢竟出於己願，感慨雖偶爾浮現，整體而言，旅程多數的時間是愉悅的。其〈初出城留別〉詩云：

朝從紫禁歸，暮出青門去。勿言城東陌，便是江南路。揚鞭簇車馬，
揮手辭親故。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³¹

³⁰ 〈商山道有感并序〉及〈重感〉二詩見《全唐詩》卷443。

³¹ 同註5。

「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對比七年前「草草辭家憂後事，遲遲去國問前途」的心境，簡直是天壤之別。在〈長慶二年七月自中書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藍溪作〉一詩說得更清楚：

太原一男子，自顧庸且鄙。老逢不次恩，洗拔出泥滓。既居可言地，
願助朝廷理。伏閣三上章，戇愚不稱旨。聖人存大體，優貸容不死。
鳳詔停舍人，魚書除刺史。冥懷齊寵辱，委順隨行止。我自得此心，
於茲十年矣。餘杭乃名郡，郡郭臨江汜。已想海門山，潮聲來入耳。
昔予貞元末，羈旅曾遊此。甚覺太守尊，亦諳魚酒美。因生江海興，
每羨滄浪水。尚擬拂衣行，況今兼祿仕。青山峰巒接，白日煙塵起。
東道既不通，改轅遂南指。自秦窮楚越，浩蕩五千里。聞有閒主人，
而多好山水。是行頗為愜，所歷良可紀。策馬度藍溪，勝遊從此始。

32

在這首詩中，白居易交代之所以選擇杭州，實是年輕時早已存在的夢想，而「冥懷齊寵辱，委順隨行止。我自得此心，於茲十年矣」，他回顧了為贊善大夫、江州司馬、忠州刺史及中書舍人以來的生活，發現對寵辱黜陟逐漸看淡及適應，宗教思想對白居易的影響，在日常生活中越來越強。如〈自秦嶺赴五松驛馬上偶睡睡覺成吟〉：

長途發已久，前館行未至。體倦目已昏，瞋然遂成睡。右袂尚垂鞭，
左手暫委轡。忽覺問僕夫，纔行百步地。形神分處所，遲速相乖異。
馬上幾多時，夢中無限事。誠哉達人語，百齡同一寐。³³

³²同註5。

³³同註5。

〈宿清源寺〉一詩亦是：

往謫潯陽去，夜憩輞溪曲。今為錢塘行，重經茲寺宿。爾來幾何歲，
溪草二八綠。不見舊僧房，蒼然新樹木。虛空走日月，世界遷陵谷。
我生寄其間，孰能逃倚伏。隨緣又南去，好住東廊竹。³⁴

赴杭州一路走來，白居易遊山玩水的情緒甚是高昂，在〈過紫霞蘭若〉中他說「我愛此山頭，及此三登歷」³⁵，沿路所見如「秋蝶」、「枯桑」、「山雉」都在他的筆下變得趣味盎然³⁶，愉悅的心情充分呈現在〈山路偶興〉中：

筋力未全衰，僕馬不至弱。又多山水趣，心賞非寂寞。捫蘿上煙嶺，
蹋石穿雲壑。谷鳥晚仍啼，洞花秋不落。提籠復攜榼，遇勝時停泊。
泉憩茶數甌，嵐行酒一酌。獨吟還獨嘯，此興殊未惡。假使在城時，
終年有何樂。³⁷

四十四歲行於商山道上的白居易，曾大嘆「潯陽近四千，始行七十里。人煩馬蹄阻，勞苦已如此」，五十一歲復行於商山到上的白居易，反而說是「筋力未全衰，僕馬不至弱。又多山水趣，心賞非寂寞」，前後不過七年，白居易心境上的差異，不可謂不大。

白居易一生最為後人所嚮往且津津樂道的，無非是他能超越生活的困頓，處處顯現隨遇而安的生活方式，不論是「適情」或「適性」，他都能在「適」中找到一股知足的「閒」味，這樣的生命情調，不是詩人與生俱來的，我們從他在商山道上所留下來的作品，看到「一步一腳印」的軌跡，經歷大半輩子的飄泊，不斷地努力自我調適，白居易的「閒適」生命情調，得來豈易哉？

貳、商山道上與元稹的唱和

白居易最早所寫有關商山道上的詩作，是在元和五年，寫這些作品時，白居易當時並未實際行役於商山道上，之所以有這些作品，乃是好友元稹因上奏河南

³⁴同註5。

³⁵同註5。

³⁶《全唐詩》卷431分別錄有〈秋蝶〉、〈枯桑〉及〈山雉〉三首詩作。

³⁷同註5。

尹有不法事及在敷水驛與宦官劉士元爭房等事，被貶江陵府士曹參軍。元稹被貶後，行役於商山道中，寄所寫之詩予白居易，白居易爲了安慰元稹，所以寫了這些作品。白居易在寫給元稹的〈和答詩十首并序〉中敘述甚詳：

五年春，微之從東臺來。不數日，又轉為江陵士曹掾。詔下日，會予下內直歸，而微之已上路，邂逅相遇於街衢中。自永壽寺南，抵新昌里北，得馬上話別，語不過相勉保方寸、外形骸而已，因不暇及他。是夕，足下次於山北寺，僕職役不得去，命季弟送行，且奉新詩一軸，致於執事。凡二十章，率有興比，淫文豔韻，無一字焉。意者欲足下在途諷讀，且以遣日時，銷憂懣，又有以張直氣而扶壯心也。及足下到江陵，寄在路所為詩十七章，凡五六千言。……僕既羨足下詩，又憐足下心，盡欲引狂簡而和之。屬直宿拘牽，居無暇日，故不即時如意。旬月來，多乞病假，假中稍閒，且摘卷中尤者，繼成十章，亦不下三千言。其間所見同者固不能自異，異者亦不能強同，同者謂之和，異者謂之答。……³⁸

元稹在商山道上所寫的十七首詩，分別在《全唐詩》396、397 二卷，而白居易的和答詩在《全唐詩》卷 425，比較這些詩篇，白居易和答之作與商山道相關的有三首，分別是〈和陽城驛〉、〈答四皓廟〉和〈和分水嶺〉。白居易以他青少年時期所走過的商山道印象，表達對元稹詩中所云商山道上所見、所聞、所感的意見與看法。

白居易〈和陽城驛〉一詩立論沿續元稹的〈陽城驛〉「商有陽城驛，名同陽道州。陽公歿已久，感我淚交流……此驛何不侔，我願避公諱。名爲避賢郵，此名有深意。……」繼續發揮，白居易寫道：

³⁸見《全唐詩》卷 425。

商有陽城驛，中有歎者誰。云是元監察，江陵謫去時。忽見此驛名，
良久涕欲垂。何故陽道州，名姓同於斯。憐君一寸心，寵辱誓不移。
疾惡若巷伯，好賢如緇衣。沉吟不能去，意者欲改為。改為避賢驛，
大署於門楣。荊人愛羊祜，戶曹改為辭。一字不忍道，況兼姓呼之。
因題八百言，言直文甚奇。詩成寄與我，鏘若金和絲。上言陽公行，
友悌無等夷。……次言陽公跡，夏邑始棲遲。……次言陽公道，終日
對酒卮。……次言陽公節，謇謇居諫司。……終言陽公命，左遷天一
涯。……願以君子文，告彼大樂師。……但於國史上，全錄元稹詩。

這樣的作品，有著「意太切、理太周」的明顯缺點，觀察白居易的創作動機，應是以安慰被貶謫的元稹為主，與「陽城驛」這個實際的地理空間，沒有直接的關係。

〈答四皓廟〉一詩的敘述與〈和陽城驛〉相同，仍是以人物為敘述重點，李白的〈過四皓墓〉中說「我行至商洛，幽獨訪神仙。園綺復安在，雲蘿尚宛然。荒涼千古跡，蕪沒四墳連。……隴寒惟有月，松古漸無煙。……」³⁹從李白詩作中可知，商山四皓古蹟已湮滅，成為歷史的陳跡。然而空間與記憶，向來糾纏不清，時間流逝了，而空間反而成為記憶的載體。元稹經過此地，有感發而為詩，白居易純然依靠記憶與想像，說出他與元稹對四皓的歷史事蹟不同的觀點。他說：

天下有道見，無道卷懷之。此乃聖人語，吾聞諸仲尼。矯矯四先生，
同廩希世資。……豈如四先生，出處兩逶迤。何必長隱逸，何必長濟
時。由來聖人道，無朕不可窺。卷之不盈握，舒之互八陲。先生道甚

³⁹見《全唐詩》卷181。

明，夫子猶或非。願子辨其惑，為予吟此詩。

元稹認為四皓之行爲前後不一，有其明顯的缺憾，因為人生應是「出處貴明白」的，針對這個意見，白居易有不同的看法。這正是一個有趣的現象，石守謙在〈古蹟、史料、記憶、危機〉一文中，將古蹟分爲「史料性古蹟」及「記憶性古蹟」，石文中說：

古蹟所具之歷史記憶，並不局限於彼歷史事件所發生之特定時空而已。當後世人開始回憶該古蹟所曾發生過的歷史事件，而發出感嘆，它本身也變為後代人回憶之一部分。換句話說，古蹟所喚起的歷史記憶並非固定不變，而是隨著時間推移，產生一波波新的添加，記憶因之在此過程之中出現一種擴延性。⁴⁰

在歷史性記憶的情況下，人們並非直接記憶著種種歷史事件，也就是說歷史記憶是靠著日後不斷地「再生產」(reproduce)才能傳遞下去的，寫詩也是另一種形式的歷史紀念活動，中國的歷史記憶有許多是靠詩人創作時不斷地提及，而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詩作從某些角度看來，存在著強化歷史記憶的功能。元稹的詩是觸景生情，而白居易之作則無關乎是否身歷其境，兩首作品意見雖然相黜，就「記憶性古蹟」的保存而言，都是具有積極正面效果的。

元稹〈分水嶺〉與白居易〈和分水嶺〉差異不大，旨皆陳述同出一源之水，隨東西不同之勢而流的自然景象，而白居易詩不管是命意、用詞、遣字都與元詩相近，無自己的創意。

比較值得一提的是，當元稹被貶江陵於商山道上，身爲好友的白居易藉著詩作的唱和不斷地安慰飽受挫折的朋友，日後當白居易被貶爲江州司馬，行役於商山道上，白居易也同樣接受到元稹的詩作唱和表示關懷。元稹最初聽到白居易被貶的反應，一覽無遺的全寫在〈聞樂天授江州司馬〉一詩：

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

⁴⁰見《當代》第九十二期「古蹟保存論述專輯」頁15。1993年12月。

窗。⁴¹

有過貶謫遭遇的元稹，聽聞白居易貶謫的反應，要比五年前白居易知道元稹的貶謫強烈深痛許多。白居易知道元稹對他貶謫的反應之後，也深為感動，赴江州途中，從襄陽轉入漢水時，白居易寫了〈舟中讀元九詩〉：

把君詩卷燈前讀，詩盡燈殘天未明。眼痛滅燈猶暗坐，逆風吹浪打船

聲。⁴²

在貶謫的途中，好友的關懷是莫不的撫慰，尤其是同樣有著「天涯淪落」遭遇經驗的知己；白居易在〈寄微之三首〉道盡了自己抑鬱的心境和思念知己的依依之情：

江州望通州，天涯與地末。有山萬丈高，有江千里闊。間之以雲霧，

飛鳥不可越。誰知千古險，為我二人設。通州君初到，鬱鬱愁如結。

江州我方去，迢迢行未歇。道路日乖隔，音信日斷絕。因風欲寄語，

地遠聲不徹。生當復相逢，死當從此別。

君遊襄陽日，我在長安住。今君在通州，我過襄陽去。襄陽九里郭，

樓堞連雲樹。顧此稍依依，是君舊遊處。蒼茫蒹葭水，中有潯陽路。

此去更相思，江西少親故。

去國日已遠，喜逢物似人。如何含此意，江上坐思君。有如河嶽氣，

相合方氛氳。狂風吹中絕，兩處成孤雲。風迴終有時，雲合豈無因。

⁴¹見《全唐詩》卷415。

⁴²同註7。

努力各自愛，窮通我爾身。⁴³

我們甚至可以說，白居易這三首詩，表現其在遭貶之後，對好友的相知相惜更逾往昔，對未來的不可預知，轉而為對好友更強烈的懸念，最後雖以睚眦作結，苦中作樂，強自寬解之意甚濃。接到白居易詩的元稹，胸中的感觸與激動，絕不下於白居易，我們看他的〈酬樂天赴江州路上見寄三首〉：

昔在京城心，今在楚吳末。千山道路險，萬里音塵闊。天上參與商，

地上胡與越。終天升沉異，滿地網羅設。心有無睚環，腸有無繩結。

有結解不開，有環尋不歇。山嶽移可盡，江海塞可絕。離恨若空虛，

窮年思不徹。生莫強相同，相同會相別。

襄陽大堤繞，我向堤前往。燭隨花豔來，騎送朝雲去。萬竿高廟竹，

三月徐亭樹。我昔憶君時，君今懷我處。有身有離別，無地無岐路。

風塵同古今，人世勞新故。

人亦有相愛，我爾殊眾人。朝朝寧不食，日日願見君。一日不得見，

愁腸氣氛氳。如何遠相失，各作萬里雲。雲高風苦多，會合難遽因。

天上猶有礙，何況地上身。⁴⁴

元稹回覆白居易的作品，情感纏綿的程度不下白居易，卻比白詩有著對現實更多的無奈與妥協，如果說白居易的詩是正陷入於惆悵情境而不能自拔，那麼元稹的作品雖有再回首已百年身的悲戚，但卻也隱約地涵蘊著自我超脫的心意。

在商山道上我們看到元、白二人，一前一後的腳印與心跡；較早有著商山道貶謫之行經驗的元稹，所帶給白居易的安慰，顯然超過白居易給予元稹的。詩歌

⁴³同註 11。

⁴⁴見《全唐詩》卷 403。

的藝術就在於內在精神和體驗與外在形象的完美結合，綜觀二人詩作，都寫出了在特定情況下的心境，這些作品所散發出來的魅力，自然不能小覷。

參、商山道與唐詩的傳播

唐代詩人原本就有題壁的習慣⁴⁵，而白居易又是一位十分重視詩歌傳播的詩人⁴⁶，走在商山道上的白居易，處處不忘尋覓詩作的痕跡，在赴江州途中，經過藍橋驛見到元稹的題詩，睹物思人，激動的寫下〈藍橋驛見元九詩〉：

藍橋春雪君歸日，秦嶺秋風我去時。每到驛亭先下馬，循牆繞柱覓君

詩。⁴⁷

唐代詩人有無處不題詩的習慣，元、白當然也不例外，白居易行於商山道上，當然會注意是否有人將他的作品題在壁上，即使有見到，自己終究不好自吹自擂，但對於見到好友的詩態度可就大不相同了，此時自然不免要大書特書一番。其實不只白居易有這樣的習慣與行爲，就連元稹也不例外，在〈駱口驛舊題詩〉中，白居易說：

拙詩在壁無人愛，鳥污苔侵文字殘。唯有多情元侍御，繡衣不惜拂塵

看。⁴⁸

白居易不僅沿途尋覓元稹的詩作，見到楊虞卿的詩作亦是心有所感。白居易自忠州返京，途經棣華驛時有〈棣華驛見楊八題夢兄弟詩〉：

遙聞旅宿夢兄弟，應為郵亭名棣華。名作棣華來早晚，自題詩後屬楊

⁴⁵可參考羅宗濤〈唐人題壁詩初探〉收錄於《唐代文學研究》第三輯 頁 56-90。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 年。

⁴⁶參考拙著〈從傳播觀點看白居易詩〉收錄於《中華文化學報》第三輯 頁 87-110。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台灣省分會印行。1995 年。

⁴⁷同註 7。

⁴⁸見《全唐詩》卷 437。

家。⁴⁹

當白居易從忠州返回長安時，曾感慨「六年不死卻歸來，道著姓名人不識」，驚訝著人們的健忘，所以當他從長安赴杭州再度踏上商山道時，又經桐樹館，見到昔日題於樑上之詩，當年的情緒又被勾起，寫出〈桐樹館重題〉：

階前下馬時，樑上題詩處。慘澹病使君，蕭疏老松樹。自嗟還自哂，

又向杭州去。⁵⁰

雖然感慨舊詩的湮滅，但在赴杭州的路上，他仍不忘題上新作，請來往士子繼和。前文所引〈商山路有感〉詩之序中有言「後來又有與杓直、虞平遊者，見此短什，能無惻惻乎？儻未忘情，請為繼和。長慶二年七月三十日，題於內鄉縣南亭云爾。」由此可見白居易仍是希望藉著題壁詩的傳播功能，讓自己的作品產生更大的影響。

在傳播的過程中，首先必須具備的要素，便是訊息的來源，訊息的來源可能來自一人，也可能來自一個團體，但以傳播的效果而言，一人的力量絕比不上一個團體，要達到一個強而有力的傳播效果，最好選擇透過團體來進行。相較於中唐的劉、柳集團與韓愈集團而言，白居易所主導元、白集團的成員間關係，並不似前二者緊密，其中有很明顯的親疏之分。元、白集團的特質，主要架構在幾個重要文人的身上，直接的以文學作品作為競爭、學習、啟發、切磋的主要對象及內容，其非正式的組織型態，就是透過文學傳播的方式，來達成同類意識的擴散。

白居易除了利用題壁來傳播之外，還利用吟詠的方式，來擴大集團的知名度及影響力，如〈江上吟元八絕句〉一詩寫道：

大江深處月明時，一夜吟君小律詩。應有水仙潛出聽，翻將唱作步虛

詞。⁵¹

⁴⁹同註 25。

⁵⁰同註 5。

⁵¹同註 7。

白居易在吟詠他人作品時，除了抒發自己情緒的感動之外，更希望企圖藉著吟詠出來的聲音去感動別人，引起注意，進而喜愛，同樣的，他也希望別人也能利用相同的方式來傳播自己的作品，如〈送蕭鍊師步虛詞十首卷後以二絕繼之〉中說道：

欲上瀛州臨別時，贈君十首步虛詞。天仙若愛應相問，可道江州司馬

詩。

花紙瑤緘松墨字，把將天上共誰開。試呈王母如堪唱，發遣雙成更取

來。⁵²

走在商山道上的白居易，不論是去程或歸途，不論是貶謫或升遷，不論心情是苦悶或輕鬆，仍舊不忘利用行役於商山道的時刻，努力把握傳播的機會，無論是透過題壁的文字書寫，或是透過吟詠的聲音傳達，我們都看到了元、白集團的詩人們最賣力的演出，尤其是元、白集團的主導者白居易，元稹曾形容當時盛況為「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⁵³，的確不難想見。

值得一提的是，白居易不僅僅意識到傳播必須突破空間的限制，更重要的是要設法延長傳播的時間，他肯定詩是可以長久傳承於後代的事業，必須用嚴肅的態度苦心經營，對於他自己的作品，白居易十分珍惜。唐人作品集大多是在作者死後，由他人整理編定，白居易不等到死後借他人之手編定，生前自己就多次整理其詩文創作，所以唐代詩人現存作品數量最多的，便屬白居易，清·李重華《貞一齋詩話》便說：「唐賢詩集惟白香山最多」。

白居易能留下這麼多作品，除了自編詩集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妥善安排其作品集的收藏與保存，在〈題文集櫃〉一詩中說：

破柏作書櫃，櫃牢柏後堅。收貯誰家集，題云白樂天。我生業文字，

自幼及老年。前後七十卷，小大三千篇。誠知終散失，未忍遽棄捐。

⁵²見《全唐詩》卷440。

⁵³見《白氏長慶集序》。

自開自鎖閉，置在書帷前。身是鄧伯道，世無王仲宣。只應分付女，

留與外孫傳。⁵⁴

「只應分付女，留與外孫傳」的作品集，在白居易看來，最後仍不免遭致散失的命運，這是他所不樂於見到的，如何將作品做最妥善的保存？白居易最後的決定是「白氏……長慶集……前後七十五卷，詩筆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廬山東林寺經藏院，一本在蘇州南禪寺經藏內，一本在東都勝善寺鉢塔院律庫樓，一本傳姪龜郎，一本付外孫談閣童，各藏於家，傳於後。」⁵⁵嚴耕望先生在〈唐人習業山林寺院之風尚〉一文，解釋白居易做這樣安排的原因是：「據白居易《東林寺白氏文集記》（見《全唐文 卷 676》），遠大師與諸文士唱和集尚藏院中，『不借外客，不出寺門。』《長慶集》亦依此例。此雖白氏信仰佛教，然五本除姪及外孫各傳一本外，三本皆藏寺院，他處概不寄藏，實耐人尋味。蓋當時除中央有秘書監集賢院藏書之外，實無固定藏書機關，惟大寺院藏書可以恆久，如遠大師唱和集者，故時人樂於寄藏耳。」⁵⁶

唐代的學術，呈現文學勝於經學的現象，科舉制度形成士家大族的沒落，平民寒士的崛起。到山林讀書的人，尤其是貧寒者大多寄宿在寺院，一方面可以利用寺院收藏的圖書；一方面利用寺院幽靜的環境，甚至可以更進一步的聽寺僧講學，白居易經常出入山林深寺，當然熟知這種情況，但在諸多的寺廟中，選擇廬山東林寺、蘇州南禪寺及洛陽勝善寺為其最終藏書之所，實與其一生的經歷息息相關，甚至可以說，早在他被貶謫至江州，經營廬山草堂生活時，便已種下了日後如此安排的種子了。

結語

綜觀白居易寫於商山道上之作，前後三次走的雖是同一條道路，相差的時間也不過七年，道路上的景觀不至於產生極大的改變，但是因為白居易個人心境的不同，導致作品中描述的景色差異極大，在〈東南行一百韻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開州韋大員外庾三十二補闕杜十四拾遺李二十助教員外竇七校書〉一詩中，白居易寫下商山道上之印象是「南去經三楚，東來過五湖。山頭看候館，水面問征途。地遠窮江界，天低極海隅。飄零同落葉，浩蕩似乘桴。漸覺鄉原異，深知土產殊。……秦嶺馳三驛，商山上二邗。峴陽亭寂寞，

⁵⁴見《全唐詩》卷 453。

⁵⁵見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後序》《全唐文》卷 675。

⁵⁶見《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頁 312。聯經出版社。1991 年。台北。

夏口路崎嶇。大道全生棘，中丁盡執殳。江關未撤警，淮寇尚稽誅。……」⁵⁷但在〈宿藍溪對月〉一詩中，白居易卻是寫「昨夜鳳池頭，今夜藍溪口。明月本無心，行人自回首。新秋松影下，半夜鐘聲後。……」⁵⁸這樣的現象，充分應證了王國維在《人間詞話》所言「一切景語皆情語」的說法。

比較白居易與元稹的商山道上唱和詩作，或比較白居易自己本人想像與實際行役於商山道上的作品，明顯看出元稹的詩與白居易實際寫於商山道上之作，無論是內容或情感，都比白居易寫給元稹的和答詩要精采感人許多。「貴真」一直是寫詩者與讀詩者一再強調的關鍵，古典詩、現代詩皆然，從白居易所寫的與商山道相關的詩作中，更清楚地看出這個現象，無怪乎嚴羽《滄浪詩話》會指出「唐人好詩，多是征伐、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⁵⁹從唐代的詩作中，我們發現一旦脫離真實的社會生活環境，是無法找到感人的文學作品。

《舊唐書·元白傳論贊》中說：「向古者傷於太僻，徇華者或至不經，齷齪者局於宮商，放縱者流於鄭衛。若品調律度，揚摧古今，賢不肖皆賞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新唐書·白居易傳贊》中也說：「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於詩，他文未能稱是也。」《新、舊唐書》的作者不約而同的承認一個不爭的事實，那就是在唐代的詩人中，作品傳播最廣、效果最好的，當推白居易為首。觀察白居易在商山道上有為之的覓詩、題詩的舉動，加上他的吟詠、作品典藏的安排，他的詩名及詩作，自然隨著他所行達到的每一個角落，從白居易在商山道上所留下的詩作，我們可以明白看出他對於傳播效果的注重，已然達於身體力行的程度，像白居易這樣重視實踐哲學的唐代詩人們，從社會中尋覓文學創作的題材，又藉著所行將詩作帶到社會上的每個角落，逐漸累積出唐代特有的「文學社會化、社會文學化」的成果。

藝術作品所反映的內容，既是作者自己的，也是屬於廣大讀者的，它是由社會政治思想和生活風尚所形成的一個特定的精神世界，在那裡不僅能映照作者的心靈，而且還能在社會引起廣泛的共鳴。⁶⁰白居易在商山道所寫之詩的特色顯示，詩人在創造其自身時，也同時創造那個時代。詩原本就是時空交綜的藝術，白居易在商山道的世界裡所寫下的作品，時空不是靜止的，而是連續的，甚至是永續的，白居易通過具體的時序、事物的變化，除了豐富了詩歌文本，同時也繁榮了唐代的文學社會。

⁵⁷見《全唐詩》卷439。

⁵⁸同註5。

⁵⁹見《滄浪詩話校釋》頁198。里仁書局。台北。

⁶⁰參考霍松林、傅紹良《盛唐文學的文化透視》頁98。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

附錄一：白居易商山道詩作繫年一覽表

唐憲宗元和五年庚寅（西元 810 年、白居易三十九歲）

△和答詩十首 《全唐詩》卷 425

分別為和思歸樂、和陽城驛、答桐花、和大觜鳥、答四皓廟、和雉媒、和松樹、答箭鏃、和古社、和分水嶺。

唐憲宗元和十年乙未（西元 815 年、白居易四十四歲）

△初出藍田路作 《全唐詩》卷 433

△仙娥峰下作 《全唐詩》卷 433

△微雨夜行 《全唐詩》卷 433

△再到襄陽訪舊居 《全唐詩》卷 433

△寄微之三首 《全唐詩》卷 433

△舟中雨夜 《全唐詩》卷 433

△夜聞歌者 《全唐詩》卷 433

△江樓聞砧 《全唐詩》卷 433

△初貶官過望秦嶺 《全唐詩》卷 438

△藍橋驛見元九詩 《全唐詩》卷 438

△韓公堆寄元九 《全唐詩》卷 438

△發商州 《全唐詩》卷 438

△武關南見元九題山石榴花見寄 《全唐詩》卷 438

△紅鸚鵡 《全唐詩》卷 438

△題四皓廟 《全唐詩》卷 438

△襄陽舟夜 《全唐詩》卷 438

△江夜舟行 《全唐詩》卷 438

△紅藤杖 《全唐詩》卷 438

△江上吟元八絕句 《全唐詩》卷 438

△途中感秋 《全唐詩》卷 438

△登郢州白雪樓 《全唐詩》卷 438

△舟中讀元九詩 《全唐詩》卷 438

△舟行阻風寄李十一舍人 《全唐詩》卷 438

△放言五首 《全唐詩》卷 438

- △ 讀李杜詩集因題卷後 《全唐詩》卷 438
- △ 望江州 《全唐詩》卷 438
- △ 初到江州 《全唐詩》卷 438
- △ 初到江州寄翰林張李杜三學士 《全唐詩》卷 439

唐憲宗元和十五年庚子（西元 820 年、白居易四十九歲）

- △ 棣華驛見楊八題夢兄弟詩 《全唐詩》卷 441
- △ 商山路有感 《全唐詩》卷 441
- △ 商山路驛桐樹昔與微之前後題名處 《全唐詩》卷 441
- △ 惻惻吟 《全唐詩》卷 441

唐穆宗長慶二年壬寅（西元 822 年、白居易五十一歲）

- △ 長慶二年七月自中書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藍溪作 《全唐詩》卷 431
- △ 初出城留別 《全唐詩》卷 431
- △ 過駱山人野居小池 《全唐詩》卷 431
- △ 宿清源寺 《全唐詩》卷 431
- △ 宿藍溪對月 《全唐詩》卷 431
- △ 自望秦赴五松驛馬上偶睡睡覺成吟 《全唐詩》卷 431
- △ 鄧州路上作 《全唐詩》卷 431
- △ 朱藤杖紫驄馬吟 《全唐詩》卷 431
- △ 桐樹館舊題 《全唐詩》卷 431
- △ 過紫霞蘭若 《全唐詩》卷 431
- △ 感舊紗帽 《全唐詩》卷 431
- △ 思竹窗 《全唐詩》卷 431
- △ 馬上作 《全唐詩》卷 431
- △ 秋蝶 《全唐詩》卷 431
- △ 登商山最高頂 《全唐詩》卷 431
- △ 枯桑 《全唐詩》卷 431
- △ 山路偶興 《全唐詩》卷 431
- △ 山雉 《全唐詩》卷 431
- △ 初下漢江舟中作寄兩省給舍 《全唐詩》卷 431
- △ 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 《全唐詩》卷 431
- △ 初領郡政衙退登東樓作 《全唐詩》卷 431
- △ 初罷中書舍人 《全唐詩》卷 433

- △宿陽城驛對月 《全唐詩》卷433
- △商山路有感 《全唐詩》卷433
- △重感 《全唐詩》卷433
- △逢張十八員外籍 《全唐詩》卷433
- △赴杭州重宿棣華驛見楊八舊詩感題一絕 《全唐詩》卷433
- △寓言題僧 《全唐詩》卷433
- △內鄉縣村路作 《全唐詩》卷433
- △路上寄銀匙與阿龜 《全唐詩》卷433
- △山泉煎茶有懷 《全唐詩》卷433
- △郢州贈別王八使君 《全唐詩》卷433
- △吉祥寺見錢侍郎題名 《全唐詩》卷433
- △重到江州感舊遊題郡樓十一韻 《全唐詩》卷433
- △贈江州李十使君員外十二韻 《全唐詩》卷433
- △題別遺愛草堂兼呈李十使君 《全唐詩》卷433
- △重題 《全唐詩》卷433
- △夜泊旅望 《全唐詩》卷433
- △九江北岸遇風雨 《全唐詩》卷433
- △舟中晚起 《全唐詩》卷433
- △秋寒 《全唐詩》卷433
- △初到郡齋寄錢湖州李蘇州 《全唐詩》卷433

Pai Chü-I on Shang Shan Road

*Pao-Ling Lee**

Abstract

Poetry is the pith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t reached the acme of its artistic perfection in T'ang Dynasty. As the poets colored their society with unprecedented charms and flavors, the study of T'ang poetry, therefore, is always an enjoyable work. T'ang Dynasty was also one of dynamic personalities. Traveling poets everywhere not only wrote poems on the road, but also brought them to every corner of the empire, and thus actualized the dynasty's peculiar phenomenon that "poetry was socialized and society was poetized."

Communications between major cities were highly developed in T'ang Dynasty. Yen Ching-Wang in his *The Road Maps in T'ang Dynasty* made a thorough study of them. The principal stage road was the thoroughfare between Ch'ang An, the capital, and Luo Yang, the East Capital. The other was South Road. In latter T'ang Dynasty, South Road beca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as cultural-economic center moved southward. Pai Chü-I, one of the mid-T'ang Poets, traveled to and fro many times along South Road, and wrote quite a few poems about it.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main artistic concern of his poetry, the writer of this paper intends to discuss Pai's poems concerning South Road from three angles—different moods on the same road, poetic communication between Yüan Jen and Pai Chü-I, and the way South Road helped spread T'ang poetry to the ends of the T'ang empire.

Keywords: T'ang Dynasty, T'ang poetry, Pai Chü-I, Shang Shan Tao (South Road)

*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Feng Chia University.